

# 论中国环境史学科范式转向

孔令昊

**摘要:** 20世纪以来,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也存在“理论范式匮乏”“史料零散”“跨学科程度不够深入”“缺乏现实关怀”等一系列的问题。西方学界曾长期陷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窠臼,生态学思想的发展为其突破“地理环境决定论”与“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提供了一种新视角。而这种生态学视野也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呈现。对西方环境史学科建设经验予以借鉴,可发现中国环境史学科范式转向的路径,进而寻找修补“人类知识”“人与自然”断裂性的方案。

**关键词:** 中国环境史;“地理环境决定论”;生态学;“人类中心主义”;范式转向

**中图分类号:** K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2023)05—0149—13

## 一、回顾与反思:中国环境史学发展的瓶颈

中国环境史<sup>①</sup>研究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至今日,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翻译了一批国外的环境史经典著作,在具体问题研究和环境史学科体系建构等方面成绩斐然。<sup>②</sup>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环境史研究也进入了转型阶段,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环境史学科研究的中国范式<sup>③</sup>匮乏。当前国内的环境史研究聚焦微观层面,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未能就中国环境史乃至全球环境史的相关问题进行宏观层面的思考。究其原因,理论范式的匮乏无疑是一个大的问题。可以说,中国环境史研究陷入了“环境衰败论”“环境破坏论”的桎梏之中。<sup>④</sup>具体问题的研究如果拘泥于特定的解释框架,则很难有所突破。

第二,环境史研究的相关史料依然呈现出零散状态,缺乏系统性。这些史料散存于正史、档案、起居注、奏章、实录、方志、笔记文集、游记、报刊、公私文书、日记、信札等文献中。中国民间文献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也可以作为环境史研究的史料来予以利用。<sup>⑤</sup>这需要研究者突破旧有的史学框架,积

**作者简介:** 孔令昊,男,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环境史、中亚史、隋唐五代史研究。

① 有关环境史的定义,学界历来有许多争论。本文采用周琼教授对环境史的定义:广义的环境史研究自然界非生物及生物各要素产生、发展、变迁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狭义的环境史应当根据不同区域的地理位置、生物类型、非生物构成等要素进行界定。参见周琼、耿金:《中国环境史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第22页。

② 相关讨论参见周琼:《继承与开拓:中国环境史研究向何处去?》,《河北学刊》2019年第4期。

③ 根据托马斯·库恩的理解,“范式”(Paradigm)指的是一个特定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集合。按既定的用法,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式或模式。相关讨论参见[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知识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库恩的“范式”概念最初针对的是自然科学,但社会科学研究者借用了这一概念,它们将范式等同于方法论、理论、意识形态等概念范畴。

④ 侯雨坚:《“环境破坏论”的生态史评议》,《历史研究》2013年第3期。

⑤ 周琼:《继承与开拓:中国环境史研究向何处去?》。

极寻找被遗忘的史料，同时开辟新的环境史史料。其中，公众对于环境变迁的感受是环境史研究者可以着重利用的史料，但这些感受很多未能进入历史学文本的范畴。

第三，环境史研究的跨学科程度大多停留在表层。很多时候，相关的研究人员并未深入了解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因而在将这些成果转化为环境史史料的过程中容易出现“转义”（Tropic）<sup>①</sup>的现象。这使得环境史研究中的很多重要问题迟迟难以突破。

第四，大多数的环境史研究缺乏一种现实关怀，其问题意识与国家、社会的现实需求脱钩，未能解决当前民众所关切的实际问题。这也使得中国环境史学偏离了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sup>②</sup>的历史学根本功能。使得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对很多更有价值的选题，如官方及民间的环境法制、环境保护及恢复良好的具体案例及理论、各地各时期的环境治理及环境管理、环境灾难应对的机制及措施、环境制裁等鲜活、灵动案例等的探讨，相对显得较少”<sup>③</sup>。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回顾环境史知识体系形成的机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环境史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一方面，西方的环境史研究无疑是一块可以“明得失”的铜鉴。通过对西方环境史发展历程的讨论，中国学者可以反观自己的环境史学科建设，达到“自省”的目的。基于此，笔者主要从“西方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视野”出发，管窥西方环境史学科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环境史学科建设的路径。

## 二、管窥与总结：西方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视野

西方学术界曾长期陷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窠臼中，无法认识到生态环境与人地关系的复杂性。而生态学思想的发展，可以为突破“地理环境决定论”与“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提供一种新视角。这种生态学视野也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乃至中国边疆史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呈现。

### （一）西方学界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潮

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似乎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典作家希波革拉第在其著作《论空气、水和地方》中曾论述了地理气候对于人类心灵、性格的影响。<sup>④</sup>该学说曾在西方地理学、历史学思想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古罗马时期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博、拜占庭时期的历史学家约达尼斯都部分借鉴了希波革拉第的观点。<sup>⑤</sup>古希腊的相关思想甚至影响了伊斯兰世界的地理学、历史学的发展，例如，著名的阿拉伯历史哲学家伊本·赫勒敦认为自然条件与地理气候能够影响人类的品德、肤色、体格与性格。<sup>⑥</sup>

启蒙运动时代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以及之后的德国思想家黑格尔都秉持类似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主张。<sup>⑦</sup>这种主张在二战之前的西方学界一直很有市场，相关研究层出不穷。以德国地理学家弗雷德里希·拉采尔为代表的“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无疑是这一思想的集大成者。“地理环境决定论”影响

① 西方话语中的“转义”是一种言语对其本义或字面义的偏离，是一种修辞行为。相关讨论见：[美]海登·怀特：《话语的转义》，北京：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2页。本质上而言，语言生来就是转义的，而历史学使用的是“日常的有教养的语言”（ordinary educated speech），赋有各种隐喻性的技巧，不如自然科学的语言那般严谨，因而转义现象似乎很难避免。笔者此处借用“转义”概念，意在强调研究者对于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误读。

② （东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卷62》，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068页。

③ 周琼：《继承与开拓：中国环境史研究向何处去？》。

④ [古希腊]希波革拉第：《论空气、水和地方》，[苏联]波德纳尔斯基编：《古代的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3—66页。

⑤ 斯特拉波在《地理学》一书中叙述了经纬度对各民族性格和风俗习惯的影响。见：[古希腊]斯特拉博：《地理学（上）》，李铁匠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94—100页。约达尼斯写于公元6世纪的《哥特史》（Getica）部分借鉴了希波革拉第的相关论点，用环境决定论的方式来思考哥特人、匈人的风俗习惯与思维状态。参见[拜占庭]约达尼斯：《哥特史》，罗三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⑥ [突尼斯]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上卷），李振中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05—116页。

⑦ 相关讨论参见李学智：《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孟德斯鸠、黑格尔“地理环境决定论”史观比较》，《东方论坛》2009年第4期。

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古典地理学，威廉·莫里斯·戴维斯及其学生埃尔斯沃斯·亨廷顿等人都曾接受拉采尔的思想。其中，埃尔斯沃斯·亨廷顿的“气候脉动说”（pulse of climate）简述了气候变迁与游牧迁徙之间的联系。<sup>①</sup>这个学说在中亚史研究等相关领域广为传播。

拉采尔与德国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等人的学说相结合，影响了卡尔·豪斯霍费尔。他的政治地理学研究最终为德国的纳粹主义服务。<sup>②</sup>早在二战前，作为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吕西安·费弗尔就反思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他认为，“所有关于地理环境决定论之讨论都可被视为‘假想敌一样的风车’，而今已无人信之论之”<sup>③</sup>。20世纪20年代前后，美国地理学界也逐渐扬弃了拉采尔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作为“区域学派”代表人物的理查德·哈特肖恩在第二代人文地理学大师C.O.索尔（C.O. Sauer）的基础上，继承并发展了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阿尔弗雷德·赫特纳的思想，这使得美国的地理学研究逐渐人文化。<sup>④</sup>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采尔等学者的思想在苏联遭到了全面的清算。俄罗斯学者叶莲娜·伊菲莫夫纳·库兹米娜也曾指出，苏联科学界因为纳粹主义而拒绝承认德国的“地理环境决定论”。<sup>⑤</sup>

在21世纪的今日，拉采尔、亨廷顿的相关学说又有被“重新发现”的苗头。<sup>⑥</sup>笔者并不赞同两位学者所鼓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而认可“地理环境或然论”<sup>⑦</sup>。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是复杂而又深刻的，不应该只用简单的决定论就加以概括（尽管这一学说正在变得越来越精致）。环境史研究的兴起，可以帮助学者们摆脱盘旋在学界上空的“拉采尔幽灵”。如果说地理学的人文转向是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来破除“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桎梏，那么西方生态学思想的发展则是从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来深化学界对于生态环境以及人地关系的看法。

## （二）西方生态学思想的发展

西方“启蒙运动”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分离，人因为自身的理性而具有了特殊性。但是动物行为学的研究，使得学界愈发认识到，人并不比动物特殊。<sup>⑧</sup>研究者需要思考如何突破“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事实上，生态学很早就开始思考人与自然以及动植物之间的关系。讨论西方生态学思想的发展，梳理它的发展脉络，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人类中心主义”的相关问题。

18世纪产生了两种看待自然的态度，分别是以吉尔伯特·怀特为代表的“阿卡狄亚”态度（田园主义）和以卡尔·冯·林奈为代表的“理性帝国传统”。<sup>⑨</sup>前者的生态观影响了亨利·戴维·梭罗、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赫伯特·斯宾塞、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等学者，后者的生态观由于更符合资本家们的现实需求而为西方的全球扩张服务。19世纪的梭罗与达尔文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吉尔伯特·怀特的思考，虽然二者

① Huntington, E. (1907). *The Pulse of Asia: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Illustrating the Geographic Basis of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pp. 359-385. 妹尾达彦赞同此说法，将3—5世纪欧亚大陆游牧民族普遍入侵归因于气候变化。参见[日]妹尾达彦：《隋唐长安与东亚比较都城史》，高兵兵、郭雪妮、黄海静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8—22页。学界亦不乏有质疑此说的学者，如《中亚文明史》第三卷认为，亨廷顿的“气候脉动说”存在着“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色彩，并不能作为对这一时期游牧民族普遍性入侵活动的准确解释。参见[俄]李特文斯基主编：《中亚文明史（第3卷）：文明的交会：公元250年至750年》，马小鹤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第11页。

② [美]杰弗里·马丁：《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学思想史》，成一农、王雪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0—231页。

③ [法]吕西安·费弗尔、朗乃尔·巴泰龙：《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高福进、任玉雪、侯洪颖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411页。

④ 杨吾杨：《地理学思想史纲要》，河南大学地理系印，1984年，第68—75页。

⑤ [俄]叶莲娜·伊菲莫夫纳·库兹米娜著、[美]梅维恒英文编译：《丝绸之路史前史》，李春长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页。

⑥ 相关讨论参见僧海霞：《20世纪初地理环境决定论视野下的中亚人群性格及成因探析》，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20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22—234页。

⑦ “地理环境或然论”代表性学者是法国古典地理学家保罗·维达尔，参见杨吾杨：《地理学思想史纲要》，第52—53页。

⑧ Monsó, S. How to Tell If Animals Can Understand Death. *Erkenntnis*, 2022 (87): pp. 117-136.

⑨ [美]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9—20页。

都强调人对自然秩序的服从，但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态观无疑更具有悲观论的色彩。<sup>①</sup>赫伯特·斯宾塞、恩斯特·海克尔等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继承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将选择学说由生物界推广到人类社会，最终成为“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石。进入20世纪，生态学时代最终到来。弗雷德里克·克莱门茨“顶级群落”概念与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学说大放异彩。<sup>②</sup>其中需要重视的是尤金·奥德姆，他的《生态学原理》一书强调必须形成统一的生态系统理论，并用数学的、统计学的术语加以精确的描述。<sup>③</sup>这是一种整体性的视角。当然，奥德姆的生态系统理论强调“发展战略”，无形中具有一种目的论的意味。

在生态整体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蕾切尔·卡逊于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推动了全球的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虽然《寂静的春天》通常被看作一本有关生态保护的科普性读物。但笔者认为，蕾切尔·卡逊在书中有着一个更深层次的思考。在提出反对使用化学农药（DDT）的论点后，卡逊在书中发出了世纪之问：“在所有这些情况中，人们都回避了去认真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是谁做了这个决定（指使用DDT）？”<sup>④</sup>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某一技术的运用不但仰赖领袖人物的决定，也体现了社会观念的选择。其背后所隐含的权力关系是值得反复思考的。蕾切尔·卡逊的生态哲学思想对于当代的环境史研究仍有诸多启发。

生态学对于生态环境与人地关系的系统性研究，构建出了一种复杂的、成体系的知识网络。这种知识网络有助于突破粗糙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以及启蒙运动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从一种更加开阔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人类历史的发展以及生态系统各单位之间的关联，为人类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指引。

### （三）生态学视野下的美国环境史研究

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源头是以弗雷德里克·特纳为代表的新边疆学派，18世纪末在美国兴起的“西进运动”（Westward Movement）是该学派的理论温床。特纳的研究冲击了美国传统历史叙事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史观，强调在边疆发现美国历史与文化，这颇有“从边缘反观中心”的意味。但需要指出的是，特纳的史观也有为美国对外扩张殖民摇旗呐喊的一面。唐纳德·沃斯特融汇了美国新边疆学派以及上述生态学的种种思想，采取了一种“反弹琵琶”的研究方式，通过对美国西部环境史的研究来重新审视美国文化传统乃至资本主义精神。沃斯特指出，人类社会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如果自然真的终结了，人类也将结束”。<sup>⑤</sup>任何试图控制自然的行为最终都会导致灾难和失败。在1992年出版的《在西部的天空下：美国西部的自然与历史》一书中，沃斯特反思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揭露美国文化传统（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文化）背后“为追求个人财富而不择手段”的理念，反思资本主义经济文化观中“生态意识”的欠缺。<sup>⑥</sup>沃斯特的相关研究在无形之中回应了蕾切尔·卡逊的世纪之问：造成这些环境问题的源头，是西方现代性背后隐藏的“无底线逐利”的文化弊病。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环境史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方向：城市环境史。伴随着城市环境史发展而出现的则是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sup>⑦</sup>在此基础上，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分成两种路径：以唐纳德·沃斯特为代表的“生态分析学派”和以威廉·克罗农为代表的“文化分析学派”。<sup>⑧</sup>虽然启蒙运动以来的西

① [美]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第145页。

② [美]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第249—394页。

③ [美]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第421页。

④ [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0页。

⑤ [美]唐纳德·沃斯特：《在西部的天空下：美国西部的自然与历史》，青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85页。

⑥ [美]唐纳德·沃斯特：《在西部的天空下：美国西部的自然与历史》，第105—118页。

⑦ 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33、249页。

⑧ 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第251页。

方知识体系强化了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但亦不乏对此进行反思的学者。英国古典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的《金枝》一书就在尼采生命哲学的基础上寻找罗马城邦基于自然的生命力来源，<sup>①</sup>以达到反对基督教救赎理论的目的。<sup>②</sup>虽然这一研究饱受学界诟病，但弗雷泽依然给学界提供了一种连接城市与自然的社會文化史视角。城市并不外在于自然，而是与自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既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观念的与社会的。美国城市环境史的相关研究以及与之伴随的文化转向正是体现了这一理念。当然这种转向过分强调文化的作用，无形之中削弱了环境史以自然为中心及跨学科研究的特色。<sup>③</sup>

笔者还想提及美国的中国学（Chinese Studies）专家欧文·拉铁摩尔。严格来说，拉铁摩尔并非环境史研究学者。至少在他学术生涯最顶峰的时候，美国的环境史学科还未形成。但拉铁摩尔正好处于美国从“汉学”（Sinology）到“中国学”研究范式转变的节点上，同时这也是环境史学科形成的前夕。因此，对于拉铁摩尔学术思想的梳理有利于了解当时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不限于环境史）的情况。

对于研究中国内陆边疆的学者而言，拉铁摩尔的书是不得不看的经典。他曾以阿诺德·汤因比为师，也深受托马斯·亨利·赫胥黎、赫伯特·斯宾塞、弗雷德里希·拉采尔、埃尔斯沃斯·亨廷顿、卡尔·魏特夫、弗雷德里克·特纳、施坚雅等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年鉴学派的特质在他的身上也能发现踪迹。因此，拉铁摩尔的史学思想呈现出惊人的混杂性，这些思想中也含有许多生态学的理念。他的“过渡地带”理论、“绿洲社会”理论、游牧与农耕历史循环性、“内外边疆”理论、“蓄水池”理论，无一不展现出一种“生态环境第一主义”的研究取向。对于拉铁摩尔而言，生态显然是人类历史发展中最根本的影响因素。<sup>④</sup>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拉铁摩尔逐渐放弃了亨廷顿“气候脉动说”以及魏特夫“粗糙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而转向“人类—环境双向互动系统理论”。<sup>⑤</sup>即使是在拉铁摩尔与魏特夫分道扬镳以后，他在阐述中国历史的时候依然会将“水利社会”与“东方专制主义”进行一定程度的耦合，这可以看作是魏特夫相关论述的弱化版本。<sup>⑥</sup>可见，拉铁摩尔自始至终都未放弃从生态学视角来阐释历史的理念。这种研究方法影响了托马斯·巴菲尔德等学者，甚至詹姆斯·斯科特对于中国西南边陲与东南亚“赞米亚”（Zomia）地区的研究也受到了拉铁摩尔“内陆亚洲研究法”的启发。<sup>⑦</sup>

综上所述，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西方生态学研究是一脉相承的，但其中也包含了对特纳为代表的新边疆学派的回应与反思。城市环境史的出现以及随后的文化转向看似背离了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取向，但其实是将其内化在了自己的研究范式之中，用一种双向互动的方式来进一步认识人类社会与自然社会的关系。这种生态学思想在美国中国学巨擘拉铁摩尔的研究中也有体现。当拉铁摩尔的研究方法被介绍到国内并被学界借鉴吸收后，中国学界的边疆史研究天然就具有了一种生态学的视野，随后的环境史转向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过程。

① 弗雷泽发现，内米自然之王的任务是确保社会在自然和巫术的包围中得以保全并且丰产。自然之王一旦衰老就会威胁整个城邦，威胁到社会的生命力。因此要把国王杀掉，把他的灵魂转入到一个更加年轻的身体中去。参见[英]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赵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2页。

② 张亚辉：《司法、创造与和平：论西方人类学的王权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22年第3期。

③ 高国荣：《美国环境史学研究》，第270页。

④ [美]罗威廉：《欧文·拉铁摩尔、亚洲与比较史学》，程秀金译，黄达远、袁剑主编：《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29—30页。

⑤ [美]罗威廉：《欧文·拉铁摩尔、亚洲与比较史学》，第31—33页。

⑥ 有关“水利社会”与“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述，可以参考：[美]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奚瑞森、邹如山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⑦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继承了从埃文斯-普理查德到埃德蒙·利奇的英国“政治人类学”研究路径，辅以拉铁摩尔、欧内斯特·盖尔纳、皮埃尔·卡拉斯特、施伟·尤义等人的影响，开启了对“赞米亚”的研究。参见[美]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前言，第6—7页。

### 三、借鉴与展望：中国环境史学科范式转向的七个层面

当今学界需要在“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碎片与整体”“社会与个人”等各类二元范畴之中反复斟酌中国环境史的研究方向与历史叙事，构建出独具中国特色的环境史学科范式。通过对西方环境史相关问题的讨论，笔者认为，未来的中国环境史研究或可从以下七个层面着手：

第一，梳理西方环境史乃至人文社科相关研究的学术谱系，打破虚构的神话谱系，注意学术谱系的断裂与重构。

从卡尔·曼海姆、米歇尔·福柯到彼得·伯克等学者，都讨论了知识背后的权力关系。<sup>①</sup> 知识不是绝对客观和普遍统一的，“而是深受空间、时间和社会的制约”<sup>②</sup>，任何知识都预设并协调着权力。因此，学术谱系的梳理工作是必要的。

不理解西方环境史乃至人文社科相关研究的学术谱系，就无法理解相关知识的生成逻辑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同时，由于权力关系的选择、话语的筛选以及文献搜集的片面等问题，研究者对于西方学界相关学术谱系的整理难免出现遗漏。这也是未来环境史研究要极力避免的问题。如濮德培在《万物并作：中西环境史的起源与展望》一书中曾指出，西方环境史研究的两大源头分别是年鉴学派与美国边疆学派。<sup>③</sup> 这种追根溯源的方式未必可信，西方的环境史理论源头远不止上述的年鉴学派与美国边疆学派。总的来看，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受美国环境史研究路径与方法的影响很大。但美国的环境史并不能完全代表西方的环境史，英、法等欧洲国家也有自己独特的环境史传统。<sup>④</sup> 法国环境史学者热纳维耶芙·马萨-吉波甚至质疑“将年鉴学派视作环境史研究先驱”的观点，而将法国环境史传统上溯至古典地理学家保罗·维达尔。<sup>⑤</sup> 这些案例从侧面体现了重新梳理西方人文社科研究学术谱系的重要性。

谱系学所伴随的文献学溯源工作具有较高的难度。知识的生产过程总是伴随着浩如烟海的文献积累，想要弄清楚西方话语体系建构的过程，就必须追溯其相应的学术谱系，并在其中找到关键性的文献，工程量十分浩大。随着 Google Ngram 等数字人文技术的发展，文献材料的检索与获取将变得越来越便利，文献学溯源工作的难度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当然，根据福柯的看法，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在历史范畴中辨别各种不同的沉积层”<sup>⑥</sup>，思考他们彼此断裂的原因。在进行学术谱系的梳理时，也需要着重关注其断裂与重构，往往这些不经意的细节是权力关系渗透的最为明显之处。

第二，扩大环境史研究的史料来源，建立环境史史料数据库。

傅斯年先生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sup>⑦</sup> 这个说法固然极端，但它点出了史料作为历史学合法性基石的地位。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学。历史学的诠释技巧都必须以史料为依托。在当今学界，历史学对于史料的定义早已超出传世文献的范畴。微观史、新文化史的兴起，驱使学者们去寻求被传统史学忽视或遗忘的史料。后现代主义史学将这些史料统一称为文本。

就环境史而言，当今环境史研究存在史料“供不应求”的情况。这需要学界去发掘新的环境史史料，

① 相关讨论参见[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引论》，霍桂桓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英]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下卷）：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汪一帆、赵博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② [英]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下卷）：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第209页。

③ [美]濮德培：《万物并作：中西环境史的起源与展望》，韩昭庆译，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第9—48页。

④ 参见包茂红：《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周琼、耿金：《中国环境史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年。

⑤ [法]热纳维耶芙·马萨-吉波：《从“境地研究”到环境史》，高毅、高暖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第129—132页。

⑥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页。

⑦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

且这些史料应当不局限于文本范畴。田野调查中获取的信息；图像、建筑、音像、衣物、饰品、遗址等非文字史料；跨学科研究的相关材料，这些都应当被纳入环境史研究的文本来源中。<sup>①</sup>之所以说是文本来源，乃是因为这些史料都需要经历文本化的过程，才能进入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流程。<sup>②</sup>

2022年出版的《近代环境史资料汇编》（全六十册），使得中国环境史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环境史史料纷繁复杂，零散而又不易获取。这类资料汇编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极大便利。笔者以为，学界在进行环境史史料整理的过程中，应当集中精力将这些史料电子化，建设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史料数据库，这样可以进一步便利学者们对于史料的查找与运用，从而推动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第三，思考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构建多元复合型历史叙事。

19世纪以来的西方学术史上曾长期存在自然法与人类学之争。社会学以现代个体为基础重新构造一个社会，其根隐喻是“利维坦”（Leviathan）<sup>③</sup>。人类学认为人天然彼此相连的，人的集体性不是自然法能够反对的。<sup>④</sup>这种争论实质上也是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唐纳德·沃斯特认为，21世纪所必需的新史学主体并非某个英雄式人物，而应该是全人类。从生态学出发重思社会发展史就会形成“环境史”。<sup>⑤</sup>爱弥尔·涂尔干与玛丽·道格拉斯等学者的相关讨论也揭示了社会对于各类知性范畴（基本观念）的影响。由此观之，似乎社会对于个人行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社会对于个人行为的作用当然是有限度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卡里斯马”（charisma）<sup>⑥</sup>式的领袖人物依然会对生态观念、环保体系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甚至这些领袖人物会被符号化，其思想也会被经典化，甚至教条化。以长时段“整体史”著称的费尔南·布罗代尔也曾迫于萨特的压力，承认事件可以让自身更加意义重大，<sup>⑦</sup>他也坦承“长时段”整体史研究对短时段事件史研究的突破有害于政治史。<sup>⑧</sup>事件的发展离不开个人的作用。

由此观之，需要审慎思考环境史研究中的社会与个人之关联，去构建更加多元化的环境史叙事。卡罗·金兹堡在《女巫与萨满》一文中认为，“任何一个研究社会运行的人，如果从整体规范或者虚构的统计数据开始，不可避免会停留在事物表面。对不规则案例的深入分析会更有成效”<sup>⑨</sup>。马克·布洛赫也提出了相关的研究方法：“特写和远镜头之间不断地反复来回，以便穿过个案投入到历史进程的全景视野的讨论中。”<sup>⑩</sup>个人对于环境的看法固然会受社会观念的影响，但其自主的能动性仍然是不容忽视的。否

① 周琼：《“创造”与书写：环境口述史料生成路径探微》，《云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周琼：《中国环境史史料学构建初探——以〈中国近代环境史资料汇编〉为例》，《鄱阳湖学刊》2022年第4期。

② 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页。

③ 利维坦是《圣经》中所记载的一头威力无比的海兽。托马斯·霍布斯以此来隐喻国家的强大力量。人类通过社会契约的方式来构建“利维坦”国家。相关讨论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8—132页。布鲁诺·拉图尔认为，霍布斯建立了一种一元大结构，将科学与技术排除在政治之外，而只讨论“利维坦”国家作为公民的代表。这与罗伯特·波义耳将政治排除在科学之外的做法如出一辙。通过这种方式，自然与社会相互割裂：非人的代表属于科学，但科学不准诉诸政治；公民的代表属于政治，但政治不能和科技所制造、动员的非人产生瓜葛。参见[法]布鲁诺·拉图尔：《我们从未现代过》，余晓岚、林文源、许全义合译，台北：群学，2012年，第105—106页。但笔者想要强调的是，这种解释方式未必是绝对的，霍布斯与波义耳并非完全对立。

④ 张亚辉：《司法、创造与和平：论西方人类学的王权研究》。

⑤ [美]唐纳德·沃斯特：《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侯深译，《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

⑥ 马克思·韦伯将政治领导的权威类型划分为三种：传统型权威、法理型权威和卡里斯马型权威。卡里斯马型权威的获得依靠领导者个人的魅力，因此又被称为个人魅力型。相关论述见：[德]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44—499页。笔者以此来指代在环境史及其相关领域中发挥独特引领才能的符号式人物。

⑦ 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二辑）·布罗代尔的遗产》，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80页。

⑧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2页。

⑨ [意]卡罗·金兹堡：《女巫与萨满》，李辰优译，陈恒、王刘纯主编：《新史学（第18辑）：卡罗·金兹堡的论说：微观史、细节、边缘》，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153页。

⑩ [意]卡罗·金兹堡：《微观史学：我所知道的二三事》，李映雪译，陈恒、王刘纯主编：《新史学（第18辑）：卡罗·金兹堡的论说：微观史、细节、边缘》，第80页。

则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就不会出现蕾切尔·卡逊这位对生态保护提出世纪之问的先驱。个人案例的研究并非排斥社会整体,它们之间是彼此相承的。

第四,重视对地方性知识、基本观念的整理与阐释。

关注碎片而非更宏大存在的趋势是“后现代主义史学”最典型的表现。海登·怀特、富兰克林·鲁道夫·安克斯密特等学者将史学降至文本维度,剥夺其认知价值。这里面有一种怀疑论的暗示,是对历史真相的过敏。后现代史学认为,历史学文本是一种“言辞结构”、一种“文学作品”或“文字制成品”。<sup>①</sup>这启示人们要用语言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并扩大史学文本(text),重视文本生产的语境。

海登·怀特认为,史学家对于史料的解读行为本质上是诗性的行为。<sup>②</sup>这句话旨在揭示历史学文本(包含史料)的诗性本质(虚构性)。但既然历史学文本存在虚构,那何妨研究文本的虚构性呢?这种思想最终影响了新文化史和微观史。新文化史对于虚构性的关注,意在发现文本中无意留下的证据。但虚构毕竟不是真相,且卡罗·金兹堡等学者所运用的实际上依然是一种阐释学的方法。笔者以为,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从原先的结果研究转向了过程研究。与其说是对真实的抛弃,不如说是在历史学研究“无法实证”情况下的“权宜之计”。

笔者认为,将上述方法运用到环境史领域时,可以关注灾害、环境知识的生产过程以及话语生成的分析,这是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视角。马克思·韦伯和克利福德·格尔兹都认为,“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把文化看作这些网,因而认为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sup>③</sup>。任何一种现象,只有当其进入到一种复杂的结构中时,才能发现它的功能并阐释它的意义。从事环境史的碎片化研究,就是要发现“地方性知识”,并了解这些知识的生成机制,阐释它们的意义。

杨念群先生在《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一书中指出,“在一些启蒙思想家的眼中,‘地方’(place)与‘空间’(space)有根本性的区别。‘地方’往往是与特殊的文化、传统、习俗等因素联系在一起,是地方性知识的载体,而‘空间’则被赋予了现代普遍主义的特征,并暗含了其具有人类普遍特质的表述意义”<sup>④</sup>。尽管这是启蒙运动时代的空间观,不是学界一般意义上的空间观。但杨念群先生对于地方的理解则是准确的。地方是相对于西方的一个概念,就如同东方之于西方那样。作为非西方的空间,地方天然具有一种反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倾向。地方性知识也是反思西方中心话语的不二利器。

卡尔·李特尔认为,文明的差异不在其实质价值(如经济价值),而主要在于其处理有限资源成功与否,也就是其环境管理程度。<sup>⑤</sup>这种环境管理的智慧集中体现在当地人群的地方性知识与基本观念之中。因此,对于上述话语体系的整理与阐释,是环境史研究需要着力的方向。历史学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研究客体处于失语地位。研究客体无法参与到研究者知识生产的过程之中。这需要研究者在历史中做田野(历史人类学)。对个人感受、体验的研究,促使研究者对“地方性知识、话语”形成思考。而达成上述目标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不把对象当作不被理解的人”。这需要研究者意识到时间与空间的非均质性,突破进化史观影响下的线性思维,对于并不现代化的区域与人群带有一种“理解的温情”。

这些地方性知识与基本观念尽管并不那么“科学”,但它们曾经是(也许现在也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也有可能是)指导当地人群日常生活、协调他们与自然关系的“常识”。马歇尔·萨林斯也认为,人

① 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页。

② [美]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页。

③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5页。

④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9页。

⑤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亚洲的去魔化:18世纪的欧洲与亚洲帝国》,刘兴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25—526页。



类社会在型构任何政治国家之类的制度前都是通过宇宙论（cosmology）系统进行治理。<sup>①</sup>这种宇宙论系统就是人类对于天地万物的看法，由一系列的地方性知识、基本观念构成。事实上，即使在现代社会，宇宙论系统依然部分影响着地方社会的运行机制。不妨以彝族“阿依蒙格”节为例予以说明。彝族传说凉山彝村有小孩夭折后变为恶鬼祸害儿童，因而举行“阿依蒙格”活动禳灾祛病。<sup>②</sup>正是前现代的宇宙论系统使得该节日与相关仪式得以形成并留存至今，并承载了独特的文化功能，从而内化为社会运行机制的一部分。

不难看出，只有通过地方性知识与基本观念，才能理解当地人群的宇宙观，进而理解当地的人地关系。环境史研究（尤其是边疆环境史研究）只有注意到这一点，才能更好地进入历史情境之中，发掘出史料背后隐藏的信息，从而更加接近客观历史实在。关注地方性知识与基本观念的环境史研究体现的正是文化史转向，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来进一步思考自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

第五，从区域研究逐步上升至整体研究，实现域内与域外的融通。

西方的东方学是将非西方地区处理为一个特殊的、封闭的、很多时候也是静止的空间，其在空间联系上也只表现出与欧洲（西方）的联系。<sup>③</sup>这一后果就是造成时间与地域（空间）的分离。<sup>④</sup>如今在进行区域环境史研究时，需要跳出“就区域论区域”的范畴，用一种关联性的、全球性的眼光来看待区域环境。

中国各区域的环境史相加，不等于中国环境史。域内环境史加域外环境史，不等于全球环境史。碎片的相加不等于整体，因为缺少整体性视角。各碎片之间缺乏关联，不成体系。一部整体性环境史，必然是一部体系史。唯有视野的开阔，才能推动环境史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点上，全球史范式的介入或可提供整体性研究的启发。全球史未必与全球有关，它也可以是区域的、微观的，但其中蕴含的整体性思考与“世界体系”的构想应是要注意与借鉴的。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正是从全球史的视角出发来理解自然生态对于人类文明进程影响的经典之作（尽管这本书的理论基础看上去是非常精致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威廉·麦克尼尔与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等学者的研究也为环境史研究的全球史范式提供了新思路。

生态系统的问题，从来不是某一区域的，而是全球性的问题。以中亚地区为例，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就“罗贡水电站项目”的相关问题产生了矛盾冲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乌方认为该水电站会破坏乌境内的生态环境。乌、塔的水资源之争跨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从地区冲突逐渐上升至国际层面，引发了各方势力的关注。<sup>⑤</sup>可见，如果不从整体性的视角来审视相关问题，甚至无法理解矛盾的起因及其发展逻辑。环境史对于具体区域、具体问题的研究，必须跳出区域界限的束缚，以一种全球性、整体性的视角来予以审视，深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

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源头是边疆史研究，因而其相当一部分的成果关注的是美国的边疆环境史，如果借鉴这一研究范式而将目光转向边疆地区，就更能感受到整体研究的重要性。欧文·拉铁摩尔认为边疆（frontier）是一种空间，可以被分为“外边疆”与“内边疆”。“内边疆”为已经被中央政权治理并控制的地区，“外边疆”则是文化风俗等与“内边疆”相似的区域，中央政权无法在这些地区形成直接的统治，因而一般采取外交或者羁縻统治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外边疆”地区的部族在政治上倾向于中央政权。<sup>⑥</sup>而边疆与内地也并非截然分开的，二者的景观呈现出一种连续、渐变的特点。因此，边疆

① [英] A.M. 霍卡：《王权》，张亚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封底。

② 相关讨论参见王美英：《彝族“阿依蒙格”节活态仪式表达与文化功能研究——基于凉山雷波大谷堆村的实践调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年第2期。

③ [美] 卡尔·瑞贝卡：《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高瑾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72页。

④ 黄达远：《欧亚时空视野中的“西北”——论“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地缘区位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⑤ 李琪：《历史记忆与现实侧观：中亚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73—177页。

⑥ [美] 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166页。

地区往往是联通域内与域外的重要空间，边疆的生态环境变迁也影响其周边区域，形成一种地缘上的连贯性。边疆环境问题一般来说，是典型的跨境问题，且呈现出整体性的特点。不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传统因素与边疆环境息息相关，跨国与跨行政区移民、资源争端、国际关系等新型因素也制造出新的边疆环境问题。这使得边疆环境史研究必须融通域内与域外，实现真正的跨境研究与整体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碎片化的研究取向本身并无不妥。中国环境史的碎片化研究其实还远远不足以支撑认识全球生态系统的内在结构。但笔者要强调的是碎片化研究背后的整体性意识、全球性视角以及对于宏大现实问题的关怀与责任，这是中国环境史学人应当具备的。

第六，建构中国环境史学科理论，突破“西方中心主义”话语。

西方环境史研究尽管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些知识、理论与经验毕竟产生自西方自己的土壤之中，将它们贸然嫁接到中国的现实环境之中，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建构中国环境史学科理论的首要工作，就是突破“西方中心主义”话语。

“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是建立在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的文化霸权之上，其突出表现是对于非西方的“常识性”表述，而这些表述通常是欧洲先进的必然性、殖民主义的合法性张目。<sup>①</sup>学界对此已有诸多批判，涉及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等各种学科。<sup>②</sup>爱德华·萨义德在安东尼奥·葛兰西、米歇尔·福柯相关学说的基础上，彻底揭示了“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东方主义”（Orientalism）<sup>③</sup>话语背后的西方文化霸权因素。而“地方性知识”正是破除这种文化霸权、建构自身现代性传统的文化资源。

前文已述“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但这些知识毕竟是前现代的产物，将其运用于现代社会，则需要一套话语转化机制，即现代性。但这种现代性只能是中国自己的现代性，而不是西方的现代性。具体到环境史研究领域，唐纳德·沃斯特业已指出资本主义文化中“生态意识”的欠缺，<sup>④</sup>而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一环，我们的环境史研究可以关照到这一层面。布鲁诺·拉图尔指出了现代性宪章的四个思想保证，<sup>⑤</sup>这为重新认识“西方现代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断裂”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中国环境史研究需要关注拉图尔对于西方现代性核心特征（自然与社会、客体与主体二分法）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思考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发展路径。

中国古代最不缺的就是对于自然环境与人地关系的思考与讨论。很多传统的环境观念及思想在早

① 如英国地理学家詹姆斯·费尔格里夫通过对全球区域环境的分析来论证欧洲崛起的必然性，参见[英]詹姆斯·费尔格里夫：《地理与世界霸权》，胡坚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② 相关讨论参见[美]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刘传珠、杨玉静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美]马丁·W.刘易士、卡伦·E.魏根：《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杨瑾、林航、周云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英]杰克·古迪：《西方中的东方》，沈毅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③ 目前学术界对于“东方学”“东方主义”的定义当属萨义德的最为经典。萨义德认为，东方学具有以下三种内涵：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方式。见：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页。笔者认为，“东方学”应当作为学术学科研究的范畴来使用，“东方主义”则应该作为思维方式、权力话语方式的范畴来使用。吴泽先生认为，“东方学”可以被分为“实证东方学”与“理论东方学”。“实证东方学”指的是对于东方诸文本的整理与研究。“理论东方学”则是旨在通过对已有的东方史料的整理和分析，来对东方地区的社会状况和历史进行研究。参见吴泽：《吴泽文集：第3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页。笔者认为这种划分方式是可以被借鉴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被吴泽先生归入“实证东方学”范畴的埃及学、亚述学等学科，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理论东方学”的色彩。

④ 笔者对这个说法事实上存在一定的疑虑。根据笔者对于布鲁诺·拉图尔等人相关研究的追溯，其实欧洲大陆一直存在反思理性传统的思想，这种思想谱系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伊壁鸠鲁主义[Epicureanism]。但鉴于笔者并未完全厘清相关谱系，也没有斟酌这一思想在庞杂的理性传统面前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所以这里姑且采用沃斯特的说法。未来的环境史研究或可发掘这方面的思想史资源。

⑤ 拉图尔认为现代性宪章的四个思想保证分别是：1.虽然我们建构自然，自然却仿佛像是我们未曾建构过的一样；2.虽然我们并未建构社会，社会却仿佛像是我们的确建构过它一样；3.自然与社会必须保持绝对分别：纯化的工作必须与中介的工作保持绝对分别；4.必须将上帝从社会与自然的双重建构中永远移除，但同时让他体面依旧，并且还有用处。现代人的力量来源于四种保证的相互制衡。参见[法]布鲁诺·拉图：《我们从未现代过》，余晓岚、林文源、许全义合译，中国台北：群学，2012年，第112—113页。

期史籍中被广泛记载。<sup>①</sup> 当今中国环境史研究可以将这些前现代社会的知识、观念借鉴并转化为中国现代化的文化传统，上可为国家提供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设性意见，下可为民众普及环境史研究的相关知识理念，从而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添砖加瓦。

第七，构建以历史学为基础的人文社科专业共同体，乃至人类知识共同体。

当前的学术研究已经进入了“后现代之后”。“后现代之后”意味着什么呢？笔者认为，“后现代之后”是对新旧史学的整合，是对人文社科的整合，同时也是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相互妥协。这并非一种学派或者理论，而是一种态度与思考方式，正如后现代主义同样不是学派一样。

新旧史学的整合，是构建人文社科专业共同体的前提。当前学界围绕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相关论点所展开的争论已经逐渐冷却。必须承认的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观点与基于语言学的诠释技巧已经成为历史学的“新规范”。<sup>②</sup> 换言之，现在要做的事情，不是拒斥后现代主义，而是想办法将他们的论点纳入自己的研究之中。同时，也要承认考据史学的合理性。彼得·伯克指出，“尽管‘实在’概念在哲学上引发了一些问题，但它对于历史学家的工作和我们所有人的日常生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sup>③</sup>。卡罗·金兹堡也通过与海登·怀特“历史诗学”的对话，驳斥了后现代怀疑论者试图抹去“虚构”与“历史”之间所有差别的相对性立场，强调历史学研究的新取向。<sup>④</sup> 既承认历史学的虚构性与诠释学的部分，又赋予考据史学以学科合法性与科学性，我想这也是历史学面对后现代风暴的一种应有的态度与胸襟。

历史学内部整合完毕后，自然就走向了人文社科的整合。环境史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经世致用，但现代世界的复杂程度远非古代世界可比。环境史想要达成上述目的，就必须借鉴、融合其他学科的成果。布罗代尔寻求一种“综合科学”，而综合科学就是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所有学科的继承与超越。<sup>⑤</sup> 这种建议实质上就是强调人文社科的整合，是对人文社科专业共同体的呼唤。但是，生态系统中的各要素相互共生，彼此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仅仅依靠人文社科的力量还不足以做好环境史研究。环境史研究者还必须与自然科学研究者结成人类知识共同体。多学科协同研究才能更好认识自然。

构建人类知识共同体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相互妥协。所谓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相互妥协，体现在如下层面：既对自然科学研究的“阐释学”面向予以揭示，又承认人文社科（特别是历史学）的学科合法性（乃至科学性）。在传统的科学哲学的话语中，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是客观理性的，卡尔·波普尔认为科学的真理性与人类活动无关，从而去寻求一种“没有认识主体的认识论”。<sup>⑥</sup> 而布鲁诺·拉图尔与史蒂夫·伍尔加在《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一书中则运用了麦克斯韦妖（Maxwell's demon）<sup>⑦</sup> 的隐喻，指出科学的秩序是从无序中被制造出来的。<sup>⑧</sup> 世界的规律也是人类通过话语来进行后天建构的结果。此外，科学与利益已然密不可分，科学事实的生产过程也是科学与资本结合的过程。这就是自然科学研究的“阐释学”面向。而对于人文社科学科合法性的承认，则是

① 周琼：《中国环境史学科名称及起源再探讨——兼论全球环境整体观视野中的边疆环境史研究》，《思想战线》2017年第2期。

② [加]南希·帕特纳、[英]萨拉·富特主编：《史学理论手册》，余伟、何立民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51—552页。

③ 彭刚主编：《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0页、第305页。

④ [意]卡罗·金兹堡：《证据与可能性：为〈马丁·盖尔归来〉所作的后记》，李根译，载陈恒、洪庆明主编：《世界历史评论：叙述事实与历史事实（第3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8—41页。

⑤ [美]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布罗代尔与综合学科：一位没有听众的布道人？》，张振江译，载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二辑）·布罗代尔的遗产》，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第9页。

⑥ [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

⑦ 麦克斯韦妖是由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麦克斯韦为了说明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可能性而于1871年设想的妖，这个妖能够按照某种秩序和规则把作随机热运动的微粒分配到一定的相格里。拉图尔以此来隐喻科学对于自然秩序的假设与建构。

⑧ [法]布鲁诺·拉图尔、[英]史蒂夫·伍尔加：《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张伯霖、刁小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41页。

回应后现代主义对于人文社科真实性的矫枉过正的指责。诚然，人文社科无法做到像自然科学那样证伪，但人文社科也有自己验证结论合理性的方式。尽管永远无法占有所有的文本证据，无法窥得人类社会过去与现在的全貌，但关键的文本证据往往能够加强历史叙事的某一维度的合理性。人文社科工作者通过逻辑将这些关键证据拼接起来，可以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实。而这则是人文社科学科合法性乃至科学性的表现。通过这种相互妥协，人文社科工作者与自然科学工作者方能意识到自己对于对方的成见，从而摒弃前嫌，协同合作。

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发展，正是要达成上述目的，构建以历史学为基础的人文社科专业共同体意识，乃至人类知识共同体意识。当今中国环境史研究者大多是人文社科出身，科学素养相对较弱，所以应当储备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sup>①</sup>需要指出的是，学科界限的模糊本就是当代学术发展的一大趋势。学科属性可以辨析、界定，但不可执着于学科差异。从历史来看，学科差异是西方现代化发展的结果，如果要超越西方，则这一层必须考虑到。定性研究不是人文社科的专利，定量研究也不是自然科学的专利。任何一门学科，涉及对客观实在的认识，都是在定性定量之间反复斟酌的过程。治学无常法，只要能有利于相关研究，则无不可用。这应该是新一代学人“为往圣继绝学”的态度与理念。

#### 四、结 语

1996年，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系统性的“文明冲突论”，认为西方的普世主义将自身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sup>②</sup>无独有偶，西北大学的彭树智先生也提出了“文明交往论”，认为人类文明交往是人类有史以来持续发展的基本实践活动。<sup>③</sup>人类的历史总是在文明的冲突与交往中螺旋递进。冲突是暂时的，交往才是主旋律。这也启示研究者要去深入了解以西方为代表的域外文明。但研究者现在似乎陷入了萨义德所谓的“东方主义”式的异域幻想之中。无论是对域外文明的浪漫化，抑或贬低化，其实都是在对其进行本质主义的处理，用以偏概全的方式来理解域外文明。而这种理解方式又会反过头来造成研究者对自己文明传统的误读。建构他者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自我建构的过程。如果对他者的认识都具有严重的问题，那就更遑论对自我的认识了。

另外，西方在15世纪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强势扩张，使得其长期主导全球话语的建构与生产。“西方中心主义”“文明等级论”“东方主义”等话语成为西方建构其域外认知体系的理论基石。这种认知体系随着民族国家等西方知识范式的推广而传播至非西方地区，导致非西方研究者在很多情况下会陷入“自我东方化”的话语陷阱中，用西方的话语来表述自己。久而久之，这些知识被权力关系塑造为“常识”，并主导了非西方研究者的观念。美国地理学家J.M.布劳特将这种知识转变为常识的机制概括为“信仰—价值体系”。<sup>④</sup>

如何打破这种信息茧房？这意味着研究者要去更加深入地研究域外文明，实现东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同时，研究者也需要回顾自己的旧有知识体系与文化传统，了解自己的过去，才能知道自己将要走向何方。当今社会，很多人鼓吹“文科（主要指历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无用论”，讽刺相关专家学者们在象牙塔中待的时间太久，所做的学术研究已经与现实脱节。“关于真相的知识必须同时是对社会负责任的知识”，<sup>⑤</sup>这就需要研究者从历史出发来关照现实。“循名责实”与“经世致用”的学术旨趣，应当并行不悖。“以历史为目的”和“以历史为手段”应是人文社科研究者们共同的追求。

① 蓝勇：《中国环境史研究与“干涉限度差异”理论建构》，《人文杂志》2019年第4期。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359页。

③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页。

④ [美]J.M.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史观》，谭荣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7—47页。

⑤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

陈寅恪先生指出，“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sup>①</sup>环境危机是当前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但人类社会充斥着“自我与他者”“微观与宏观”“历史与现实”“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等各种二元对立的元素。这些元素彼此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断裂性。这种断裂性阻碍了人们对环境危机的处理，人类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无法得到保障。环境史学科的发展，可谓适逢其时。以伊曼努尔·沃勒斯坦为代表的前辈人文社科研究者业已指出，“现在需要做的一件事情不是去改变学科边界，而是将现有的学科界限置于不顾，去扩大学术活动的组织”。<sup>②</sup>断裂是现实，而融合是愿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未来发展路径，正是“断裂下的融合”，是提供一种修补“人类知识”“人与自然”断裂性的方案。

## On the Paradigm Shift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 Discipline

KONG Ling-hao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Since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search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but there are still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theoretical paradigms”, “scattered historical materials”, “insufficient interdisciplinary level” and “lack of practical concern”. The western academia has been trapped in the stereotype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for a long tim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though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breaking through the concepts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and “anthropocentrism”. And this ecological perspective has also been further presented in the study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By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 it is possible to discover the path of the paradigm shift of the disciplin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China, and then find a solution to repair the rupture of “human knowledge” and “human and nature”.

**Keywords:** Chi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Ecology, Anthropocentrism, Paradigm Shift

[责任编辑：赵蔚平]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266页。

② [美]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06页。